

海康党史資料



第二輯



海康縣志

海康党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海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一九八七年五月

封面题字：陈光保

峥 岁 月

目 录

- 烽火年代回忆 金耀烈 (1)
- 浅谈海三区武装斗争 陈开濂 (14)
- 回顾海康革命斗争情况 黄 轩 (24)
- 我在纪家地区工作的一些情况 黄 夏 (51)
- 伟大的支援
- 解放海南岛支前工作的回忆 陈开濂 (61)
- 新寮党建政回忆 唐智土 (67)
- 沈塘区革命斗争片断 黄 琦 (72)
- 渡琼作战追忆 符 炎 (78)
- 海康统战工作片断 郭庆时 (83)
- 回忆流沙连 尹圣甫、尹成石、尹圣明 (87)
- 一支活跃在敌后的武工队 陈 胡 (90)

专题研究

- 遂南区革命斗争概况 陈质彬 (9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康革命
 斗争概况综述 洪元整理 (102)
日军在海康的暴行录 林年升整理 (109)

纪念先烈

- 烈士英名 永垂青史
 —— 纪念黄杰牺牲六十周年 县委党史办 (112)
诗五首 翁泽民等 (115)

人物春秋

- 与肖光章在一起的日子 黄 明 (117)
程庚烈士传略 关 祥 (121)
林飞雄在遂南区 蔡文德 (124)
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欧龙腾、欧立新、符 炎 (126)

考证

- 日本侵略军登陆雷州半岛的时间考证 许盼宁 (128)

附：纪念沈斌逝世一周年诗文选

烽火年代回忆

金耀烈

我首先谈一谈雷师的情况：

我是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由党组织派去雷师读书，做学生工作的。

我去雷师的时候，主要是跟唐勤联系。那时，我读高中一年级，唐勤读高二。当时高中部党组织基础比较好，已经成立了党支部。但是我没有参加党支部，只是直接跟唐勤联系。这样有利于党在学校中的抗日工作。我在雷师读书有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我们在农村中搞宣传工作，也在学校里搞宣传工作。当时雷师校长比较反动，他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的活动。虽然他不一定知道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组织，但是他看到我们开展抗日运动这样积极，又是唱歌，又是演戏，又是组织读书会，又是出墙报，表现得比较进步，所以就引起他的注意。我在雷师读书时，发展了几位同志，有黄雪霞、黄色五、朱日成、林里、黄汉等，后来又接收了陈日新的关系，学校抓不到我是共产党的证据，就给我一个“丁”字操行。因为是“丁”字操行，所以学校就不准我读书了。当时党组织便决定让我撤退了。

我撤退后，于一九四一年春节后，就到迈毫教书。过了

春节不久，学生将要回校读书了，可是就在这时，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在雷州登陆了。

我一听说日本侵略军登陆，就立即赶回雷师去，那时，有几个我们党的同志已先我一步回到了雷师。于是，我们就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雷师搬在太平附近的古卢山村。这是一个大村，村里的枪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发动学生和村里的一批青年组织武装，准备打日本。搞了半个月，枪支搞到了，可是不几天，日军就撤走了。于是我们便把枪支退还给老百姓，大家也分散了。这样，我又回到迈毫教书。

可是我们的这一行动，更加引起了雷师反动校长邓思乐的注意。党组织认为我们在那里搞武装斗争，有些同志已经暴露了，于是就布置雷师党支部里的一些同志撤退。

当时雷师党支部书记叫邓其敏，组织叫他撤退去教书，但他不同意去，不服从组织调动，加上平时表现也不那么好，结果他退党了。

后来，组织决定待学期结束才撤退。党员撤退后，我还在迈毫教书。

由于党组织需要我去做学生工作，搞学生运动，所以来由唐勤去联系，我便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到南强中学读书。

我到南强读书后，邓其敏也走了。因此第二学期党组织又布置一些同学进雷师去开展工作。这一段时间团结了一个体育教员（他姓什么记不起来了），于是这个体育教员便同反动校长邓思乐引起了矛盾，因而闹起了学潮，那个体育教员把邓思乐打得很伤。

就在这时候，梁和受组织的委派，来到南强中学跟我联系。梁和原来在遂溪中学读书，是我的领导人，组织派他到雷师读书后，他也是党领导人之一。搞起学生运动以后，梁和来到南强找我，要我帮助他在湛江印传单和散发传单。那时我在南强中学发了很多传单，也发动学生支援雷师学生的学潮运动。

在学潮运动中，邓思乐被打伤了，因此他就跟国民党勾结起来，逮捕了梁和、全国明、陈日新、黄汉等同志，还逮捕了那个体育教员。后来，这些同志经过他们的父母和当地进步人士通过国民党的关系，都担保出来了。

四〇、四一年，我们党组织在雷师做了很多工作，发展得比较好。

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下岚沿岸登陆。当时，我不在家过春节，在学校里组织进步同学下乡搞宣传工作。当我们刚下到支仁山的村时，便接到了日军登陆的消息，于是我们就立即赶回学校里去。这时正是寒假，在校学生很少。这样，我们就联系家在湛江的学生回校搞抗日宣传工作。

同时，我们也去找沈斌。当时沈斌在湛江开一个铺，实际是一个交通站。于是在我们设法联系学生和联系上级的情况下，通过沈斌和陈恩取得了联系。陈恩叫我找地方住了下来，并告诉我说，要等党组织研究决定后，才能行动。

过了二、三天，日本兵就来到了广州湾（赤坎），国民党不抵抗，没打什么仗，都逃跑了。因为当时湛江是属于法国所管的，因此日军就去同法国谈判。经过谈判，法国同意日本部队进入广州湾，这样广州湾就乱起来了。日军在那里抢东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我在湛江等了一个多月以后，组织就决定我和陈兆荣、黄雪霞回到海康和遂溪边界地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工作，陈兆荣为领导。这样，我们三人就从广州湾回到了我的家。

当时黄雪霞在下六村教书，我通过亲属的关系，也找到了一个点教书。这样我们就利用教书的机会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我回去家乡后，主要是联系我以前一起读书的那些同学和所认识的当地的一批进步青年开展工作的，如黄色伍、黄廷瑶、朱日成等。通过这些人在各村开展工作，建立阵地。

到了六七月，局面渐渐打开了。铺头村有个叫陈其谋的，当日本兵来了以后，他在村里组织了二三十人出来当伪军，但后来由于和别的伪军有矛盾，他自己就回来了。于是，我们就去做他的工作，争取他过来抗日。他的弟弟比较进步，我们也通过他弟弟去做工作，结果把他争取过来了。我们派郑世英、张鸿谋到他的部队去当排长，郑世英还当了他的中队教官。此外，我们还通过宗族关系，利用陈其谋到海康、唐家去联络陈展。过去陈展在国民党那里当过兵，日军入侵后，他不跟国民党走，留在地方自拉武装。因为日军到处屠杀老百姓和奸淫妇女，因此他们也愿意起来抗日。于是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去做陈展的工作，结果也把他争取过来了。

我们联合陈展建立海遂联防大队以后，第一仗就是去打江洪，并且打了胜仗。因为打了胜仗，所以就有影响。当时是陈展当大队长，大队部驻在曲港。那时通过乡村筹了些粮，并在曲港征收市面税也筹了一些钱，所以生活还勉强过得去。

因为打了江洪，伪军和日军准备向我们进攻。那时伪军

(和平队)住在纪家，也传出许多关于要打我们的消息。因为陈展和陈桐有关系，所以他去和陈桐联系，陈桐派欧明良打进来。我们对于他的行动很注意。那时，我们党组织的负责人是陈兆荣。我们还单独组织了一个政工队，周斌是指导员，我是政工队长。并在政工队中成立一个党支部，周斌当支部书记，我当支部副书记，陈兆荣是代表上级党组织来领导我们的。

欧明良来了以后，极力主张打纪家。当时我们党组织考虑到，在打江洪时，部队组织纪律不好，如果再去打纪家，恐怕没有什么把握。就是打胜仗，纪律不好，同样在政治上影响不好，所以我们不准备去打纪家。但是由于欧明良来后，他极力主张打纪家，而陈展又挂名在那里当大队长，他也同意去。他是个主要领导，如果我们说不去，那就不太好，所以由于形势所逼，结果也就去打纪家了。但是打了两天都打不下(第一天早上去打，打不下；打到第二天早上)，就撤退回曲港。打纪家，虽然没有死人，但我们消耗很大，有的还受了伤。撤退回来后，情况很不好，除打不下、消耗大外，还因为是打了败仗回来，大家有意见，团结搞不好，于是大家都分散回家了。在这期间，我们工作很困难，一方面打仗消耗了子弹，没有补给；另一方面是打了败仗，乡村群众也不太支持我们，所以粮食也有困难，因此部队士气比较低落。

因为我们打了江洪，又打了纪家，所以周围震动很大。日军与和平队就组织来进攻我们。那时，谢云阶和谢云尝住在企水。在困难时，我们准备去和他们联系。当时他们人也不多，但企水是个渔港，所以他们经济情况好一些，他们的

活动范围比较广一点，再加上当时他们也有点抗日，于是我们就去联系他们，想取得他们给我们一些支持。这样就把部队拉到企水去。这时，已是年底十二月，就要过元旦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敌人来进攻了。因为我们御敌不过，于是就从企水撤退到海康城西边。过了两天，敌人退了，我们就又拉回曲港去，在曲港坚持一个月左右，就要过春节了。可是在曲港，局面还是打不开，敌人还是经常来骚扰我们。我们从上面得到情报说，日军准备向西面进行“扫荡”。此时，陈兆荣已经不在这里，后来组织就派庄梅寿来到这里。庄梅寿来后，考虑到部队当时枪支弹药、粮食供给不上，在海遂边界一带活动困难很大，局面打不开，于是就决定撤退到海徐交界一带活动。这样一方面可接近国民党陈桐，因为他当时抗日，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陈桐身上，对他有些依靠；另一方面，海康、徐闻交界一带，国民党和日军两方力量都不到那里，这时已经是春节前夕了。组织决定我们把部队先拉去徐闻，去跟陈桐谈判，联系好后，就拉回海康、徐闻交界一带活动。于是，我们就在曲港和企水找到二、三只船，坐船从海上去到迈陈，在那里驻了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去跟陈桐谈判，当时是我、陈展、陈其谋和欧明良四个人去到徐闻县城找陈桐谈判，但是陈桐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他的意图是想把我们部队编入他的部队，由他来管。政工队呢？就编入徐闻县的宣传队。但是我们的部队和政工队是在一起，都是属于海康、遂溪的部队，眼下只不过是暂时的困难，才撤退到徐闻，以徐闻为后盾，想他给一些枪支、弹药作补充，所以我们不同意他的要求，这样谈来谈去都没有结果。

于是我们就立即回来。大约回到半路的时候，陈桐这个

家伙就带几个卫兵随后追上来，他说，想来布置一下，在途中与陈展谈了几句，他就走了。我们也回到迈陈去。但我们在路上就考虑，我们已经在县城跟他谈过了，为什么他还要来呢？这就值得我们怀疑。当时周斌是支部书记，庄梅寿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到徐闻后，庄梅寿已经回到上面汇报去了，不在我们部队里。周斌就召集杨美经和郑世英、陈质等同志开会，研究为什么陈桐又会跟着来。正在研究的时候，陈桐就派人通知欧明良、陈展、陈其谋等几个人去开会，而不通知我们。这样就使我们更加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什么问题呢？有什么暴露了呢？我们以前在曲港一带，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有没有可能已经暴露了呢？欧明良这个家伙是不是特务呢？是不是准备来捉我们，把我们部队搞散呢？经过研究，组织就决定将部队撤离徐闻。当时这个部队基本上是我们掌握的，政工队是我们掌握的，我们原来有个中队，有几十人，陈其谋的中队有几十人已合编在一起了，于是我们就动员部队立即拉走。除了他们几个人去开会以外，所有同志连晚饭都不吃就立即拉走了。从迈陈一直拉回英楼、流沙，足足走了一夜。

我们部队回到流沙港，天已经亮了。在那里吃了早饭，接着又去了解情况。当时听说，日军正从北和、乌石组织到嘉山岭“扫荡”，驻在嘉山岭的海三区部队已经疏散了。究竟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不清楚，只是群众这么说。但不管如何，吃了早饭后，约莫到十点钟，我们部队还是继续向嘉山岭开去。因为嘉山岭树林比较多，容易隐蔽，所以我们就开到那里去。从流沙到嘉山岭，本来路不远，但是我们下午三、四点钟才拉到那里。

究竟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日军“扫荡”嘉山岭以后，他们还住在嘉山岭附近。我们白天拉部队上山，就去找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福秋，了解到，当日军来“扫荡”的时候，王福秋、廖培南、王建涵等所领导的部队，已经疏散了。

我们晚上九点钟才找到王福秋，把问题摆出来商量，王福秋的意见是：第一是要我们把部队立即拉走，当晚就要离开嘉山岭；第二是把部队疏散，总之是不能把部队留在那里。因为他们的部队已经疏散了，领导疏散也布置好了，如果我们部队在那里跟日军打仗，给敌人发现，引起敌人大“扫荡”，就会使地方部队损失更大。

经过研究，我们就把部队拉上来，跟周斌、郑世英、杨美经、陈质等几个领导商量。大家认为，现在如果把部队拉出去是可以的，但是眼下部队弹药很少，大约平均每支枪只有三至五发子弹，出去后万一遇到敌人的话，御敌就很困难了。而当地部队的枪支弹药比较多，虽然疏散时都藏起来了，但是在我们部队拉出时，是否向当地部队借些子弹和手榴弹来补充一下，以保证部队撤退呢？要是借不到，部队要撤出去，危险很大，那么部队就在当地疏散为宜。周斌去跟他们商量时（王福秋没有直接跟周斌商量），他们不同意借手榴弹和子弹，他们说枪支弹药都是当地老百姓的，不能借。最后，我们便把枪支弹药也藏起来，按班分组疏散，先在山里藏几天，敌人撤退后再走。

虽然我们部队已疏散了，但是王福秋还担心，我们部队都是外地来的，不会讲本地话，有的还讲白话，这么多人分散在山里，如果敌人来“扫荡”，捉到一个的话，就会出问题。最后就决定除了领导以外，其他同志是暂时分散回家。

但这时人已经分散了，于是又集中起来，为了解决路费，有钱的同志就把钱借出来，分给没有钱的同志，路近的一夜就回去了，路远的借了钱也走了。但是原属陈其谋部队有五个兵却无家可归，在分散以后，一起去徐闻找陈其谋，找到陈展和陈其谋后，这五个兵又带陈其谋回嘉山岭。大概在九点钟，他们便按照联络信号和联络地点找到我们，要求我们把枪支还给他们。周斌、张鸿谋、郑世英、陈质、杨美经等和我以及几个短枪队的同志在一起商量，决定把枪交回给他们。我们把枪交回给他们以后，在山里隐蔽了两三天，然后就分散回到有基础的村庄作长期打算，以教书先生的身份进行隐蔽。我到英岭村去教书，黄雪霞到靠近英岭的那个村（现在记不起这个村名）去教书，又有几个同志分散到流沙去。这个事发生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在英岭教书，大概两个月后（即五月的时候），陈宏良通过他的关系到北海找到了邓汝模，回来后又继续搞武装。那时日军经过大“扫荡”后没有发现我们什么动静也退走了。这样，形势就有了好转。于是我们就准备人和枪，打算成立抗联大队。一面去跟国民党联系，争取共同抗日；一面在当地活动，组织枪支，拉出几个中队去跟伪军（和平队）打。覃斗有个中队，王建涵是中队长，廖培南是副中队长，这个中队首先在覃斗一带活动。我们拉几个中队在覃斗与伪军打了一次仗。我们中队长王建涵脸部受了伤。这场仗，两方的头头都受伤，但我们是打了胜仗。

打仗之后，我们继续发展部队，联合陈宏良海三区抗日联防大队，一共组织起三四个中队。其中后洪林隆盛组织一个中队，陈宏良组织一个中队，王建涵、廖培南组织一个中

队（这个中队是主力）。这几个中队组织起来后，便开到流沙、英岭、覃斗这个三角地带，即是嘉山岭以西直到乌石一带的农村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又组织打乌石，但打了两天多，却打不下，敌人的援兵就赶到了，于是我们部队就撤退回英岭。我们撤回英岭后，敌人继续进攻我们，但被我们打退了，虽然没有缴获到敌人的武器，但是我们还算是打了胜仗，所以士气很高。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打胜仗呢？主要原因是这里群众支持，地形复杂有利，利用农村的台枪。我们善于近战，用台枪打得敌人惊魂落魄，而海三区有盐场，枪支子弹比较多，打起仗来，子弹补充容易，所以我们能打胜仗。

打退敌人以后，我们又在这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但过不多久，日军和伪军又组织大“扫荡”，我们没有办法，于是就组织撤退。因为流沙那个地方有许多石，地形比较好，于是我们在撤退时，就在那里打了一场阻击战，这也是因为撤兵来不及，而逼着打这场仗的。打了这一仗后，我们在流沙找到了船，于是就坐船过流沙港到对面的徐闻去，这是什么村名，记不清楚了（按：如是流沙对面，那是大连）。

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天，这时陈桐也开许多部队来。他的目的是为截住日本部队，不让他们过这个港到徐闻去。但是我们部队已经退到那里了，他为什么又来这么多的部队呢？而且陈宏良这个家伙去跟他谈什么，又不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对陈宏良有点怀疑，主要怀疑他是不是跟陈桐勾结起来搞我们的鬼。由于陈宏良和陈桐在那里勾勾搭搭，引起我们怀疑，所以我们就去找船，把部队撤回海康，过了流沙港，在靠近嘉山岭的英楼村住下来。

在英楼村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叫做曲界的小圩。我们部队派人早上到这个小圩去买菜，了解情况。打听到陈邦带便衣队去嘉山岭捉王福秋。当时王福秋是海康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这一带隐蔽活动。但是他在海三区比较有名。我现在讲的是五六月的时候，他在这里已经搞了两年时间了，所以嘉山岭许多人都认识他。接到情报后，我们就一起研究。如何去营救王福秋呢？是把部队统统拉去吗，又考虑到嘉山岭那里有日本部队在“扫荡”，夜间出去又不了解情况，遇着敌人会吃大亏；要是夜间派一个人回去，又考虑到找不到人；要是派部队在途中等接吗，可是又路又太多，不好等。当时党组织派联络员唐勤在鸡刚啼时起程趁天亮之前回到嘉山岭去，当时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可靠。可是唐勤一回到山上，第二天早上王福秋就被敌人捉去了。唐勤以为王福秋被捉后会有什么特殊情况，于是便赶紧回海康城去向上级汇报，他在途中，没有东西可吃，饿得很，于是就吃了一肚石榴，后来肚痛了三天，不幸逝世。

由于王福秋被抓走了，唐勤又牺牲了，这样部队与上面暂时联系不上，于是就沿着北和和企水方向拉回遂溪南区去，在客路、城月、太平之间的楠敢、家寮、坑仔一带住了几天。后来跟上级党组织联系后，上级认为部队不可能在这带活动了，于是就决定把部队拉回海康去。这样，部队就按原来的那条路线回到英楼附近活动。

我们部队下到英楼不久，就接到上面的指示，又拉回河头去，与界炮的部队汇合。这时共有四五个中队到乐民、海山、河头一带来，陈恩、黄其江、唐才猷等同志也都来这一带活动，一共在这里活动了一个多月到二个月时间。这个时

候是一九四四年八九月。部队在这一带，到各村去住，搞宣传教育，做群众工作，扩大队伍。

因为我们部队集中在这一带活动，把海山村几个反动分子的家抄了，把反动分子黄汝清杀掉，所以国民党又准备来“扫荡”，进攻我们。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上级决定我们部队组织一个独立大队，于是我们便在吾良村成立了一个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朱强（支仁山）是大队长，高老唐（唐多慧）是政委，陈兆农是副大队长。

由于敌人准备来“扫荡”，所以第一大队成立后，就南下海康。下海康后，我就不当中队长，调到大队部当工作人员。因为我在西部沿岸线随着部队来来往往，在流沙、英岭、嘉山岭、企水一带活动，比较熟悉情况，所以我跟大队下海康，并在大队部工作。大队下海康后，就在北和、企水和杨家之间的一带村庄活动，在靠近北和一边活动多一些，但具体住在什么村庄呢？现在记不清楚了，大约活动了一个多月，国民党邓汝模组织一个大队，也回到这一带活动。那时，我和谢云尝较熟悉，因为我原来在曲港已搞过部队，已经跟他们有过联系。这样组织上就想去争取谢云尝部队跟我们合作抗日，或者争取他们中立也好。邓汝模那时是逃亡县长，他逃到北海那边去，刚刚又从北海回来企水一带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占地盘。因此大队就派我和陈开濂同志去跟谢云尝谈判。并说我们想跟他们合作，一起抗日。我们跟他们联系之后，他们有些同情我们。

邓汝模是一个坏家伙，当邓汝模部队开回来时，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搞清楚了，于是我们就组织起来打邓汝模，消灭了他一个中队，全部缴了他们的枪，打死了十多个人。我们